

容闳与太平天国

胡巧利

由农民知识分子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具有以往农民起义所没有的特点，最为显著的是其领导集团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洪秀全和洪仁玕都曾或多或少地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接触，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使这场农民革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取基督教的某些元素，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组织农民革命的手段；一是颁布《资政新篇》，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设想。由于这些特点，它吸引了世界的瞩目，西方商人、传教士、各国驻华使节以及少数具有先进资本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各怀其不同目的访问太平天国，从而使太平天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也日益增多。近代第一位接受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毕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爱国知识分子——容闳，于1860年11月访问了太平天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与容闳的关系，反映了太平天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本文试图以探讨容闳天京之行失败原因为切入点，分析太平天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方面的价值取向。

—

容闳于1860年11月18日抵天京，至12月24日离开，在天

京逗留 36 天。其间，他向总理朝政的洪仁玕提出了建设太平天国政权的七项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① 此七项建议，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是一幅简明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年前，太平天国已颁布了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这是被后来学者誉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宏伟规划”的重要文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外交等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如主张“地方自治”、发扬“公议”、“上下情通”等；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如兴办铁路、公路、邮政、银行等；文化和社会风俗方面，提倡设立学馆、医院、育婴堂等社会事业；在外交上，主张与西方列强平等交往。容闳的方案与《资政新篇》在旨趣上来说完全相同，但两者又有差别，《资政新篇》内容更加丰富宏大，而与当时太平天国现实的差距更大。1859 年前后的太平天国，正是大敌当前。在长江中游，湘军在屡经大败后重振旗鼓，攻陷江西全省；天京外围，清廷陈兵四万，从水陆两路围困太平军，天京危机重重。《资政新篇》的设想在此形势下显然难以实施。

反观容闳的方案，则有所不同。容闳一生都以教育救国为奋斗目标。他对太平天国的建议，自然也以教育为核心。但我们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容闳的建议中，前三条都是关于加强军事力量的。在容闳的头脑中，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太平军要实行近代化方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0 页。

首先是要推翻清政府，巩固新政权，这就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一个能英明决策的领导集团。在前来天京的途中，他对太平军的所作所为及品格素质也已有所了解，故而首先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然后才提及“建设善良政府”，把经济建设和教育改革放到了最后。可以说，容闳的人生目标没有改变，但在实现目标的策略上，他审时度势，作了相应的调整。容闳的建议，比之《资政新篇》，虽内容不及其宏大丰富，但重点更加明确，也就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可行性。

再就情势而言，1860年夏，太平军第二次粉碎清军的江南大营，东征苏常的战役又胜利进行，整个局势出现了好转，为天京内讧以后的最好的形势。容闳到达天京时的太平天国，无论是从政治上来说，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有能力采纳容闳建议中的前三项，从实际军事斗争的需要来说，更应该采纳容闳的前三项建议。但是，洪仁玕在第二次会见容闳时，虽对容闳的建议逐条加以讨论，对其“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但又表示“第善善不能用”^①。实际上是将它束之高阁了。容闳的七项建议，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可以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容闳天京之行的目的，“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②不料结果毫无所得，于是匆匆返回上海。

二

容闳天京之行失败的原因，从容闳方面来说，是因为对中国传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统思想文化缺乏较深的了解，其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与中国封建农民（包括封建乡村知识分子）差距甚大。

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容闳的建议不感兴趣，但对于容闳的到来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洪仁玕对容“极表欢迎。寒暄后即询予对于太平军之观念如何？亦赞成此举而愿与之共事否？”^①两天后，再与容闳会谈，对容闳所提建议逐条讨论。又数日后，封容闳为义爵，是太平天国后期仅次于王爵的爵位。显然，洪仁玕是极想留住容闳的。只是他采取的留人方法是封建的那一套东西：高官厚禄。在封建农民的价值观里，以给予高官厚禄表示对一个人的看重，是很自然的事。在曾是封建乡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洪仁玕的价值观里，这也许是最能体现他们的诚意和重用人才的方式。如洪仁玕初到天京时，天王封以福爵，几天后升义爵加主将，三天后改封为干王，并命其总理朝纲。而作为受封者的洪仁玕，他的感受是：“我主恩加叠叠，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贵，特加殊封。予自受（封）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②但容闳是一个接受系统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着当时一般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民主自由精神，尤其是他接受的是教会教育，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炼。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分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③所以，他论事论人，也极注意从品格意志和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考虑。容闳的价值观，与农民阶级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当他接到洪仁玕派人送来的义爵封印，感到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9 页。

②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46 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页。

就不仅仅是惊讶了。“干王以此授予，意果何居？其以是为干旌之逮欤？然未先期得予同意，不可谓招以其道。岂谓四等荣衔，遂足令人感激知己，抑亦隘矣。”^①他认为，干王既表明自己的方案“第善善不能用”，又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封自己为义爵，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进而对太平天国事业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得出了“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②遂匆匆告辞，怅然而返。

曾有学者认为，容闳离开太平天国，是“拒绝参加农民革命”；他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和农民革命格格不相入。^③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冷静地看一下容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会发觉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难免失之偏颇。早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容闳就非常关注太平天国起义，几次写信给香港的友人，请求告知有关情况^④。归国后，容闳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杀害响应太平军的无辜百姓，对满清政府深表痛恨，“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⑤由痛恨清政府而对太平天国起义深表同情。1860年10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这使容闳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0多天后，容闳投奔了太平天国。此行是他同情太平天国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救国图强心切的必然选择。他希望平生所主张的教育计划与改良政治的愿望，能通过太平天国有所实施，以改造中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救国心切的容闳对太平天国政权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后，容闳亲眼目睹了太平军的所作所为，仍对太平军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5页。

④ 袁鸿林：《客闳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予赞扬，“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非如纣之不善，盗跖之率徒为暴”。^①首次与洪仁玕见面，即提出七项建议，并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当知道自己的建议不能实施之后，容闳决定离开太平天国，同时再次表示：“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可见，容闳并非无心参与太平天国革命。此后，容闳对太平天国有一个总的评价，认为“太平军之起，固宗教上之逼迫使然。实则亦非真因，不过爆发之导火线耳。”“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具有两面性：“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面。”^②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③但他又肯定了太平天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④平心而论，容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可称得上客观公允。

容闳没有留在太平天国，主要原因之一是双方思想观念上的冲突。

三

然而，对于容闳南京之行的失败，我们不能仅从容闳身上找原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理性分析，即还应该从当事者的另一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方——太平天国领导人那儿找原因。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认识不足，是容闳天京之行失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1840年的鸦片战争用枪炮迫使清政府国门打开部分，而先进的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西方先进文化的优长，自林则徐以后，寻求救国强国之路的先进分子“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1842年，魏源编定《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使这一思想为更多先进人士所接受，并获得了发展。与容闳同时代的王韬和冯桂芬等也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主张“采西学”、“制洋器”。这说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已成了当时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活动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太平天国，对于西方先进文化取何种态度呢？

不可否认，太平天国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如：吸收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发动革命的武器；采用洋枪洋炮；颁布《资政新篇》等。但从实际来看，太平天国仍然采用称王称帝的封建王权专制、等级制和特权制、父传子的王位世袭制、一夫多妻制等。天王声称“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①。洪秀全甚至颁发《多妻诏》，规定“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②。可见，洪秀全并没有真正学到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他所提倡的平均平等，实质上是封建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反应。太平军曾大量使用洋枪洋炮，李秀成“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③。但这样的学习是肤浅的、表层的，尚处于自发阶段，是某些将领的分散活动。作为太平天国政权来说，并没有自觉采取学习

① 丛刊本《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页。

② 《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 《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1983年版，第95页。

西方军事技术的具体措施。《资政新篇》是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方案，却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而不代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洪秀全在书中多处批“是”或“此策是也”，但未将它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作为典章制度颁布。^①总之，就太平天国政权而言，几乎没有向西方学习的自觉努力。曾有论者把太平军中有人会说简单的英语、读科技书籍、采用洋枪洋炮说成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这是把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简单化、庸俗化了。

根据汤因比的文化“挑战——回应”模式，当一种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的挑战时，这种文化想要生存，就必须作出回应^②。面对两次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和容闳的七项建议），太平天国作出的回应是令人失望的。以封建乡村知识分子为领导核心、以封建农民为主力的太平天国，其价值观不可能超越封建藩篱；而他们的学识、阅历、政治素养的局限，使得他们不可能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表现出应有的敏感性，不可能站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浪潮的潮头。容闳离开太平天国，关键原因即在于此，在于太平天国没能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这与其说是容闳的失败，倒不如说是太平天国的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以后，容闳成了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的幕僚。1863年，当曾国藩听说容闳其人后，即对他发生极大兴趣，嘱幕僚张世贵、李善兰先后共5次致函容闳，请其速往安庆。容闳于9月间抵安庆面见曾国藩，提出了设立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并命其全权采办机器。“自予与曾督第二次晤谈，一星期而有委任状命予购办机器，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军功……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领款。款银共六万八千两，半领于上海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版，第860页。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道，半领于广东藩司。”^①此后，容闳协助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学校。容闳之所以进入曾府，其最后目的仍是为了他的“教育救国”计划：“予初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②实际上，容闳的教育计划后来也的确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得到了部分实现。

容闳主动投奔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设太平天国的建议，得到的是一个义爵虚衔。曾国藩五次派人致函容闳，面谈后即命其全权采办机器。容闳的两番遭遇，形成鲜明对比。这恰好反映出太平天国领导人与洋务派在政治素养和识见上有着高下之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上，两者所迈出的步子也有着较大的差距。当然，曾国藩也不能真正改造中国，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③

太平天国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并没有迈出多远，但从客观上来说，它对中西文化交流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对“洋兄弟”的开放，使中国农民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文明，也使西方对中国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它还促使清政府内部的有识阶层把林则徐、魏源等人早已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变成了实践活动，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识到了建设机器厂以制造机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洋务运动。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